

专题

← (上接7版)

流寓,号曰马流,世称汉子孙也。”这里引到的两种书,俞益期《笺》即《俞益期与韩康伯笺》,韩康伯在东晋中期担任过豫章太守,俞益期是豫章人,曾经到过交州,“闻马将军故事”(殷芸《小说》)。俞《笺》是写给韩康伯的系列书信,讲述了在交州的见闻,大概因为内容新奇,被南北朝很多著作引用。《林邑记》据考是南朝时期的著作。而《水经注》最前面未标明引用的“昔马文渊积石……南极之界”一句,也抄录自刘欣期《交州记》,刘欣期据考是东晋后期人。总之,《水经注》中的这段描述,直接来自东晋中后期至南朝前期的一些著作,可以认为这是关于马援铜柱知识集中出现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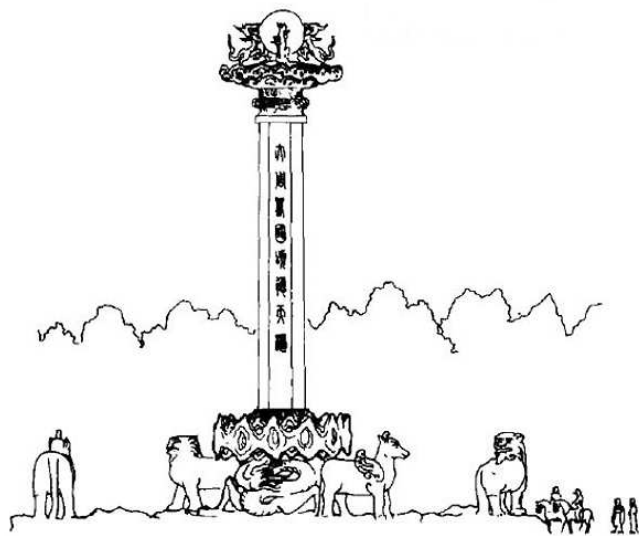
作为可以确定的最早记载,西晋张勃《吴录》的用语也最为谨慎,说到西屠国有铜柱,西屠国人“自称汉子孙,他们“云”铜柱为汉疆场之表,尚未提及马援。东晋中期的俞益期《笺》,在交州所“闻”的马援故事,便丰富了许多,首先铜柱数量确定为两根,而铜柱附近的居民,不再是“自称汉子孙”的西屠国人,而是马援留下的遗兵“马流”,这些遗兵的姓氏、婚姻、户数无不历历在目。而《笺》又说“铜柱今复在海中,正赖此民以识故处也”,寻其意铜柱已没于海中不可见,“马流”人成为其故处的标志。由此推断,张勃以来的记录者并未亲眼见铜柱,关于铜柱的信息皆来自传闻,传闻的来源可能是西屠人或“马流”的自述。马流,在《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南蛮传》等文献中记作“马留人”,留、流意义有别,虽可殊途同归地表示他们与马援军队的关系,但两者音近或非巧合。清末学者丁谦即推测“马留为南洋黑人种族之名,或作马来,亦作巫来由,皆音译之转。今云马援所留,实望文生义之谈,不足为据”,此说得到不少现代学者的认同。果然如此,则马流、马留实为对当地人自称的一种谐音附会式曲解,那么铜柱亦极有可能是该地原有之物,却附会到了马援的名下。换言之,马援是否立过铜柱,如果立过则究竟立于何地,这些数百年后得自异域传闻的记载,并不能给出确切的回答。身在刘宋知识界中心的范晔,一定读过有关马援铜柱的记载,也一定听过相关的传闻,但在《后汉书·马援传》中仅提到了铸铜马式而只字未及铜柱,或许不是一个简单的遗漏。

范晔大概只是个特例,对于大多数南北朝隋唐时代的人们来说,众多文献都提到的马

援铜柱,其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唐初最终完成的《梁书》《晋书》等更具权威性的史书,都提到了马援立柱或铸柱,然而追溯其史源仍主要是上引几种文献。隋唐时期,王朝军政力量再度达到中南半岛东部时,又出现多次亲见马援铜柱的记载。大业元年(605),刘方率军征林邑,自比景海口破敌而南,“迺马援铜柱,南行八日,至其国都”。在林邑国都北八日程之地应该确有铜柱,然而未必是马援铜柱。唐朝前期取道南海前往天竺求法的僧人,在行程记录中也常会提到铜柱。比如慧命禅师“泛舶行至占波,遭风而屡遭艰苦,适马援之铜柱,息比景而归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命的求法之旅止步于占波,即林邑国,在返回的途中先过铜柱,再到比景(即比景),与刘方的路线恰好互相印证,他们所见的很可能是同一个“马援铜柱”。另一位道琳法师在南海航行的路线是“越铜柱而届郎迦,历河陵而经裸国”,大致也是沿着今越南海岸南下,再进入马来半岛中部,但此铜柱的具体位置难以确考。如同铁门关是西域陆路的象征一样,铜柱成为南海航路的象征。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序言中说:“独步铁门之外,巨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正是对西域南海两条求法路线的概括。熟悉文章典故的求法僧们见到的铜柱或非一处,他们大概都不会怀疑,自己看到的就是“马援铜柱”。

还有几个例子,更能证明唐代的“马援铜柱”不止一处。唐人刘恂《岭表录异》载:

旧有韦公干为爱州刺史,郡即汉伏波铜柱以表封疆,柱在其境。公干利其财,欲推谿货之于贾胡。土人不知援之所铸,且谓神物,哭曰:“使君果坏是,吾属为海人所杀矣。”公干不听。百姓奔走诉于都督韩约。约移书辱之,公干乃止。韩约任安南都护在唐文宗大和元年(827)至大和二年,如上所述,此时爱州境内确有铜柱,但



天枢想象图(引自李松《天枢——我国古代一种纪念碑样式》,《美术》1985年第4期)。武则天在洛阳铸造的“天枢”,毁于唐玄宗先天二年,最终只留下文字记录。

“土人不知援之所铸,且谓神物”,断定为“汉伏波铜柱”的依据不详。唐代爱州约当汉九真郡北部,与两晋以来传说中铜柱所在的日南郡象林,显然不在一地,与上面提到隋朝刘方所经的铜柱,相距也十分遥远,此铜柱非彼铜柱。到《新唐书·南蛮·环王传》中又出现一种新说:

环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劳,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其南大浦,有五铜柱,山形若倚盖,西重岩,东涯海,汉马援所植也。又有西屠夷,盖援还留不去者,才十户,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马,俗以其寓,故号“马留人”,与林邑分唐南境。

这里说铜柱在林邑南境,与刘方和慧命等所经的位于林邑国都以北八日程的铜柱显然有别。此说还将此前文献中分别出现的西屠夷与马留人划上了等号,显示出糅合诸说的倾向。更让人瞩目的是这里的铜柱变成了五根,“山形若倚盖”难解,大约是长短不一排列成了某种形状,而且其位置“西重岩,东涯海”,较此前的描述也更为具体。这些唐代的铜柱都应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它们形态各异,且立在不同的地点,至少不可能都是“马援铜柱”,更可能都是被附会为“马援铜柱”。

云南滇池东南稍远的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这件青铜贮贝器上也有祭祀铜柱场面。这些都是汉代的文化遗产,可见铜柱在当地文化中渊源已久。

综上所述,从西晋到隋唐关于“马援铜柱”的知识常常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甚至互相矛盾。这样的马援铜柱只是一个符号式的存在,对于实际铸造铜柱来说,模仿马援铜柱,只能是一种理念层面而非操作层面的模仿。那么,在技术层面上,溪州铜柱的设计灵感和铸造技术究竟从何而来?这还得考虑唐代的立柱纪功风尚的影响。

风尚与技术：唐代的立柱热

唐代出现过多次树立铜柱的事件。天宝八载(749),何履光率军至南诏境,取安宁城及盐井,“复立马援铜柱”。此安宁城即今云南安宁市,在滇池西岸,复立说明该地原来曾有铜柱。有趣的是,在滇池东岸的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文化”青铜器中,就有一件“杀人祭铜柱场面盖铜贮贝器”,滇池东南稍远的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贮贝器上也有祭祀铜柱场面。这些都是汉代的文化遗产,可见铜柱在当地文化中渊源已久。虽然马援的征战从未到达云南地区,但这些已消失的铜柱也被附会到了马援名下,并且被何履光作为“马援铜柱”恢复了。

更著名的是马摠的例子。马摠在元和四年(809)至八年(813)间担任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旧唐书·马摠传》)马摠既在安南汉所立铜柱之处特铸二柱,可以推测原铜柱已不存,其“旧址”也只能来自众多传说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铜柱上还有“刻书唐德”,已经有了铭文,可惜今日已不知铭文内容。“以继



南诏铁柱,唯一幸存的唐代铁柱,又因与溪州铜柱时代十分接近,其形制十分值得关注。资料图片

伏波之迹”,在《新唐书》中写作“以明伏波之裔”。据《元和姓纂》,马摠为马援兄子融之后,自周齐以来代居宪府,号为“御史马家”。马摠铸立二铜柱,确有强调自己是马援后裔的意图,这与马希范铸立溪州铜柱颇有相似处。此事距离溪州铜柱的铸造只有130年,不算特别遥远,不过在溪州铜柱的铭文中并未提到马希范等人是否了解马摠的事迹,今已无法揣测。

武则天在洛阳铸造的“天枢”,虽与上述“马援铜柱”及其仿造品性质不同,但在铸造技术上却有相通处并远高于前者,堪称古代铜柱的登峰造极之作。694年,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设计规格极大。洛阳胡商聚钱百万亿,购买铜铁尚不足用,又征敛民间农器以凑足原料。第二年四月天枢建成,高105尺(31.5米),直径12尺(3.6米),八棱八面,每面宽5尺(1.5米)。底座为铁山,周长170尺(51米),又以铜铸蟠龙、麒麟萦绕。顶端为腾云承露盘,直径三丈(9米),其上又有高一丈的四龙人共捧一火珠。根据其体积和用铜量粗略计算,可知天枢一定是中空的铜柱。天枢的柱身八面刻有武则天自书的标题“大周万国颂德天枢”,以及武三思撰写的颂文,后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溪州铜柱在这几点上都与之颇为相近。唐玄宗先天二年毁天枢,取其铜铁充军国杂用,壮极一时的天枢并未存在多久,最终只留下文字上的记录。

如果将铁柱也纳入视野,则有景龙元年(707)六月唐九征讨伐云南姚州蛮和吐蕃后所立铁柱。战前吐蕃人以“铁钅”即大铁索在漾、瀾二水架桥,通西洱蛮,筑城戍守。唐九征战胜后,拆毁铁索,铸立铁柱以纪